

■乡风民俗

红灯笼

钱续坤

“打灯笼，照母舅，母舅躲到门背后……”每当年夜饭之后，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我的老家，会有同一首歌从不同的方向悦耳地响起——那是耐不住喜悦的孩子们，在打着红红的灯笼开始游戏了。游戏的地点自然选择在村中的祠堂里，但见五颜六色的灯笼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孩子们的笑脸映照在炫目的光环里，犹如那一盏盏艳丽的灯笼，格外好看。

孩子们手中所提的灯笼，多数呈椭圆形，也有正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甚至三角形的，长辈们将其统称为“长命灯”，其寓意自然是“长命富贵”了。灯笼通体由竹子制成，不仅是因为竹子容易弯曲造型，同时还有“四季常青”“竹报平安”的寄托，故而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做上几个大红的灯笼，既图个喜气洋洋，也把它当成好日子的火种，以此希望薪火相传。当然，也有在灯笼上面描上五谷蜜蜂，隐喻“五谷丰（蜂）登（灯）”；画上喜鹊梅花，寓意“喜鹊登（灯）梅”；描上五个娃娃，暗合“五子登（灯）科”的，这些大多寄托了父老乡亲美好的心愿，同时也是除夕一道独有的风景。

在我们乡下，关于“点灯笼”的由来似乎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姜子牙的传说。姜子牙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享有“百家宗师”的美誉。传说他在封完神之后，自己却没有什么司职，只有在某位神仙出游时前去替班；大年三十晚上，众神都回归原位，姜子牙却无处可去，百姓见他十分可怜，于是在高杆上面点燃一盏灯，让其在灯下蹲上一夜，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点灯笼的习俗。年幼的我之所以对这个传说百听不厌，津津乐道，一则可能与自己从小喜欢涉猎神仙鬼怪的离奇故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吵着父亲，在繁忙的腊月里抽空多扎几只红灯笼了。

这里用“扎”而不用“做”，是与故乡常见的一种职业——“扎匠”密不可分的。木匠面对的是树木，石匠敲打的是石头，扎匠使用的多为竹子、藤柳、芦苇之类，而这些正好是制作灯笼的主要材料。父亲并没有拜师学过这种手艺，但他深知扎灯笼是个细致活儿，需要经过片竹、削竹、编织、定型、上纸、写字、上油等繁琐的工序，并且每个工序都需要严谨地操作。父亲始终认真地对待每一盏灯笼，他甚至虔诚地认为，每盏灯笼是有灵魂的，只有让每根竹条都规规矩矩、恰到好处地排好队、站好岗，灵魂才能在灯笼的身体里呆得安稳，过得舒适。因此不论他做的鲤鱼灯、兔子灯、莲花灯、寿桃灯等等，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形神兼备，是我们弟兄三人在小伙伴间炫耀的资本！

灯笼的腰身一般由红色的皱纹纸裱成，抗烧性能较差，遇到大风劲吹或者受到外力影响，里面的蜡烛很容易将外围的纸张点燃。可顽皮与淘气是孩子们的天性，年夜饭过后，大家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攀比一番，比比谁的衣服好看，比比谁的红包更厚，当然也会比比谁的灯笼更好，不服气者有时还会狠下“毒手”，想方设法让你手中的灯笼引发燃烧。此类事件倘若真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得牢牢记住：不许哭泣！不许胡闹！因为在乡间，在除夕，是有许多忌讳的。平时管教比较严厉的父亲此刻也会一反常态，憨笑着安慰你说：“红光在，喜气就在！”随后，他还会变戏法似的，拿出另外一个崭新的灯笼，让你重新加入到那一闪一闪的红色光团里，尽情地嬉戏玩耍到元宵佳节。



老家 李海波 摄

■人生笔记

腊月二十四小记

王金桥

腊月二十四，也称“扫尘日”。

所谓“扫尘”，就是从这天起至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清扫蛛网、扬尘，清洗衣物、整理家什，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迎新年。祖母在世时常说，这是“除尘（陈）布新”嘛！

儿时，渴望这天早日到来，因为福利甚多：新衣新鞋可以试穿，糖果点心可以放开吃，烟花爆竹可以拆开放，寒假作业可以不用做，兄弟姐妹可以任意嬉戏打闹不挨骂……但又敬畏这天到来，因为大人们是要“扫尘”的，大扫把、小笤帚，长竹篙、短掸尘，扫尘的工具应有尽有。一年下来，那种土坯房子的扬尘多，楼下扫得勤倒好些，特别是楼上靠瓦椽的位置，扬尘积得成带状垂下，父亲告诉我们，这叫“扬尘吊子”。我们最怕这玩意儿，大毛毛虫似的。就是这样，大人们紧急时，也会喊上我们帮忙。虽然我们都像大人们一样全副武装，但那阵子的脏兮兮、灰蒙蒙，让我们极不情愿参与的。这便是敬畏“腊月二十四”的缘由了。

现在老家都是楼房，装修讲究，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都是瓷砖，生不起扬尘。腊月二十四这天，父母简单地捋飧几下，整幢屋子便整洁了。现在的小朋友们，已不再有亲身体验“扫尘”的机会了。

腊月二十四，是南方的“小年”。每年这天，我们全家都回老家先祭祖，陪父母吃过中饭，再回县城陪岳父岳母吃晚饭，彼此也都兼顾上。

今年腊月二十四清晨，父亲便打来电话，说昨夜雪下得大，特别是进村的水泥路面结了冰，一再要求我们等路面好了再回去不迟。

妻子也闲不住，利用这大好时间，带领儿子又将家里扫、拖、抹、洗一番。屋外寒风凛冽，家内温馨如春。我调侃妻子，咋就这么勤快哩！妻笑答，奥密戎病毒最怕干净了。原来，腊月二十四“扫尘”，既有祈求新年安康，又有“驱除病疫”之意。

微信上来消息，有朋友要我为其书写三幅对联十个“福”字。朋友住省城，是位年轻的作家，文学造诣日益精进，房子也弄了两套。他开心地说，两套房子三个门。他开心，我也暗暗为他开心。因为我深知，他的成功很艰辛，却更励志。我刚好得闲，立即回复：“好的，写好即寄。”约摸二十分钟，任务完成。妻子端来热茶一杯，我一边让她看得如何，一边呷茶笑语：“窗明几净，红袖添香。窗明几净，红袖添香啊……”待墨迹干透，交给顺丰。

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去“老巷口”。老巷口是饭店的名字，我们在这里陪岳父岳母吃小年饭。饭后，陪岳父岳母打几局掼蛋。兴尽而归。

和亲朋喝几杯老酒，遇熟人致几句祝福，陪老人们吃顿饭……平淡，自然，真诚，温馨，愉悦。也许，这就是普通人家所要的幸福。

■流年碎影

读着来信过大年

阮德胜

1991年冬天是绿色的，我参军了；那年的除夕是白色的，天下雪了。午饭后，我们欢快地穿行在雪花中，做着过年前的准备。连里“命令”我将元旦出的黑板报换成与春节有关的内容。就在我画“灯笼”的时候，邮递员伸着头、推着车从雪幕中顶过来，他是被一群贴对联的女兵先发现的，她们把对“年”的兴奋转移到对邮包的热情上。其实，我也是。但我没有走过去，我是男兵，要有男兵的稳重。

邮包没有辜负我的热情，里面装了我的四封来信。这个除夕，我就在阅读和反刍这些来信中度过，味儿有点啃青苹果，解馋不解饱，泛酸不泛甜。

父亲的是一封回信。他简单回答了我上封信提出来的几个关于家里情况的问题，其重点还是嘱咐：“一人在外要一人担”；“听首长的话，跟领导走”；“走出家门，找的是前途”。而后，父亲告诉我，镇上送来了“光荣人家”的牌匾和770元义务兵优待金。牌匾，姐姐已将它钉上了门框，红底、隶书、金字；优待金正好填上了因水灾歉收而未完成的公粮税。这封信，让我读到了父母的希望，读到了肩头的份量，也读到了天生我才的信心。

哥哥那时在国有冶炼企业的厂办学校当老师。他的信，每个字都是活的，因为他告诉我，他恋爱了。女朋友是城里人，比他小四岁，在棉纺厂工作。我心里嘀咕，我比他女朋友还大一岁，将来怎么喊呀。哥哥还告诉我，由于我不在家，他没有接受女朋友家人的邀请在城里过年。哥哥没有“娶了媳妇忘了娘”，我有点感谢哥哥，要不两个儿子都在外过年，父母是何等心情？

接下来，是家乡《池州报》副刊编辑丁育民先生寄来的样报。丁先生用毛笔在四版“杏花村”的报眉上写道：“小阮：三件来稿，今用俩。注意用你的笔去关注你的生活。新年、新春一并问候……”我看到了发表在报纸上的散文诗，一则是《问候池州》，一则是《绿色的感觉》。丁先生是家乡的老辈文人，他是我文学之行的引路人。带我“走路”的时候，他五十八岁，我十八岁。在家，每逢节日，我都去拜望他，而这年除夕，他却给我发来了问候、送来了“礼品”。用这个心情看这个除夕的雪，更白、更亮。

余下这封信，是“她”来的，我一直忙到“央视春晚”直播前的几分钟才细看。她是我的女同学，在省卫生干校读中专。信是她在放假离校的时候寄的。信不长，让我有沉重感。她是一个不善交际的女孩，“周边环境”较差，她说：“读这个书，还不如去打工。”她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拿着粮油本说不当城里人”，我们不就是为了想吃几天城里人的饭才一直奋斗？她让我等到开学才给她回信。我被噎住了。大年三十，我被一个自认为能与我谈心、交情的人噎住了。记忆也就有了深刻。

